

农业补贴政策的区域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典型主体功能区为实证

王亚运,蔡银莺,朱兰兰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基于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划的分析框架,以武汉、黄冈以及荆门等典型地区的 6 个乡镇 42 个行政村的 518 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主体功能类型区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并运用 HLM 模型进行分层并讨论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存在提升效用,但因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民的承包权意识,因而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建立的情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一定的抑制性。(2)村庄和农户个体两个层面均有指标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在村庄层面,是否有公交对农户感知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农户个体层面,村干部经历、自身自信程度、抵抗灾害能力、耕地块数、农业生产工具等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也有着显著影响。(3)不同主体功能区受访农民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所占收入比重较大,受访农民对政府农业补贴标准的敏感度较高,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略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民。

关键词 农业补贴;政策效应;影响因素;HLM 模型;主体功能区

中图分类号:F 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7)01-0008-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7.01.0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为了支持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农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党和政府对这一问题格外关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趋向”的论断,表明我国已经走过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阶段,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阶段^[1];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也表明农业经营发展已经到了变革的阶段,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保护。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政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是解决城乡问题的基本政策导向和发展趋势,而农业补贴政策则是重中之重。

国外进行农业补贴支持的历史悠久。美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为了稳定和提高生产者投入,正式通过了农业补贴政策。1996 年出台的农业法案,将对农业的部分价格支持改为对农民收入的支持。2002 年出台新的农业法案,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拨款。2003 年出台农业援助法案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等受到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2-4]。欧盟进行农业补贴的时间也比较久远,1992 年欧盟的农业保护政策从以价格支持为基础,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基础。1999 年欧盟在《欧盟 2000 年议程》中强调对农业补贴进行彻底改革^[5-6]。东亚近邻日本对农业的保护支持的力度也是极大的。

收稿日期:2016-02-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土空间管制的外溢效应及调控原理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413715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异质效应及效能提升研究——以成都、上海、苏州及广东等典型创新实践区域为实证”(7157309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的制度创新经营及配套政策设计”(2014RW013)。

作者简介:王亚运(1990-),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及农业经济。

通讯作者:蔡银莺(1979-),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经济与管理。

比如1995年的《新粮食法》,1997年的《大米流通法》等^[7]。虽然农业补贴的相关法律制度起源于美国,但真正把农业补贴政策进行全面研究则是开启于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James、Littlet等、Anderson等在研究中均认为:应该把农业补贴的思想渗入到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中,它对农产品的价格、福利等有很大的影响^[9-11]。而Lopez等、Wise则对农业补贴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农业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价格,误导了消费者,不建议保留农业补贴^[12-13]。

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焦点是对国外农业补贴政策介绍与比较。例如,程国强、柯炳生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对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参考^[14-15]。另一大焦点则是对补贴政策实施效果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对农业补贴指标的测算和农业补贴效果的计量分析。田维明等与朱希刚等分别测算出了1986年、1993年和1994年我国生产者补贴值,他们认为我国的农业补贴力度不够,甚至很长时间内为负补贴^[16-17]。张莉琴利用1984-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双对数拟合分析,得出这一时间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对提高农民收入贡献最大,而政府对农产品实施的提价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18]。钱克明分析了我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认为我国“绿箱”支持结构被严重扭曲,存在巨大的“绿箱”漏洞和空白^[19]。陈波等以河南省为例阐述了我国部分粮食主产区实施直接补贴的必要性^[20]。刘鹏凌通过对安徽省农户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安徽省粮食补贴的效果^[21]。

以上研究可见,对农户的自然经济特征与农业补贴实施效果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粮食主产区的补贴实施效果,而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区域差异性的关注度不高。本文根据《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分别选取了武汉、荆门、黄冈三个市共六个县区作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典型研究区域。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区定位、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有所差异,农业种植及收入水平也存在着显著差别,故对农业补贴的感知度及其实施效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所以研究不同主体功能区下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多角度、全方位来完善我国的农业补贴制度,加大扶持农业发展体系有一定帮助及参考意义。

一、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1. 区域概况

2012年12月湖北省政府印发《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从开发方式的角度将湖北省国土空间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从开发内容方面划分为城市化区域、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本文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出发,选取了武汉市、荆门市、黄冈市的部分区域作为典型区域进行研究分析。

武汉市江夏区、黄陂区、蔡甸区以及荆门市掇刀区距离各自城市中心较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发展潜力大、集聚人口和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宜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是重点开发区的典型区域。荆门市京山县位于江汉平原北端,拥有 1.01×10^5 公顷耕地,农业发展条件较好,是湖北省优质棉、水稻的生产基地,从保障农产品和永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其功能定位主要以提供农产品为主,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典型区域。黄冈市麻城市地属大别山山区,境内山地丘陵占70%以上,生态系统脆弱、生态功能重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的开发条件,需把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是生态功能区的典型区域。

2. 数据来源

课题组十余名成员于2013年10-11月期间在荆门市京山县、掇刀区、武汉市黄陂区、江夏区、蔡甸区、麻城市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回收问卷553份,由于部分村庄样本较少,加之部分问卷存在缺省值,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518份,占样本总数的93.7%。

农户个体问卷的设计内容主要包括:(1)受访农户的基本情况,主要为受访者是否为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过村干部、是否有承包地、是否务农、身份类型、月收入、农业收入比等。(2)受访农民土地补贴情况,主要为各项补贴的标准、类型、补贴形式、执行年份以及发送形式。(3)农业补贴的满意度,主要为对农业补贴的评价、实施农业补贴后耕地保护意识和承包经营权等变化、农

业种植积极性变化等。

二、变量设定及模型选择

1. 变量选择与设定

调研的问卷涉及村庄的基本特征、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和受访农民对农业补贴评价情况等三个方面。在查阅相关文献以及跟调研组成员讨论,筛选出适合本研究的变量(见表1)。

(1)个体自然特征。个体自然特征主要包括受访者是否为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和是否务农以及性别。

(2)心理特征。心理特征对于农户政策效应的评价的影响愈发突出,而当前研究则较少涉及。基于此,本文选取对自身的信心程度、幸福感指数和对灾祸的抵抗能力等指标来反映农户自身的心理状态。

(3)经济特征。家庭经济特征的差异对于农户对于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生产工具数量、农田分布情况和贷款情况等。

(4)村庄特征。村庄之间由于地理、经济等情况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认知,本文选取了距离最近城镇的距离以及交通情况等来反应村庄的特征以研究其对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

表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或单位	变量类型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以农业种植的积极性等价代换)	极大提升=1;较大积极性=2;有一定提升,不太大=3;积极性比较小=4;起不到作用=5	虚拟变量	518	2.52	0.66	1	5
是否户主	是=1;否=2	虚拟变量	518	1.53	0.50	1	2
性别	男=1;女=2	虚拟变量	518	1.41	0.50	1	2
层-1——个体自然特征							
年龄	受访者的真实年龄	连续变量	518	53.96	11.19	21	80
教育程度	接收教育的时间,以年为单位	连续变量	518	7.01	3.40	0	17
是否担任过村干部	是=1;否=2	虚拟变量	518	1.87	0.34	1	2
是否务农	是=1;否=2	虚拟变量	518	1.15	0.45	1	2
层-1——心理特征							
信心指数	很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虚拟变量	518	3.37	0.78	1	5
幸福感指数	很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虚拟变量	518	3.44	0.84	1	5
对灾祸抵抗能力	很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虚拟变量	518	2.98	0.96	1	5
层-1——经济特征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家庭总耕地面积/家庭总人口数	连续变量	518	3.11	2.51	0	25
农业收入比	(0.9,1]=1;(0.7,0.9]=2;(0.5,0.7]=3;(0.3,0.5]=4;(0.1,0.3]=5;(0,0.1]=6	虚拟变量	518	2.92	2.20	1	6
生产工具类别数量	受访家庭的实际情况,以个数为单位	连续变量	518	1.12	1.08	0	6
农田分布块数	受访家庭的实际情况,以块数为单位	连续变量	518	5.03	5.81	0	100
贷款容易度	不清楚=0;非常困难=1;困难=2;一般=3;较容易=4;非常容易=5	虚拟变量	518	2.29	0.98	0	5
层-2 村庄特征							
到最近城镇的距离	距离调研村庄最近城镇的距离,以“里”为单位	连续变量	42	3.67	1.86	1	6
是否有公交	是=1;否=2	虚拟变量	42	1.71	0.46	1	2

2. 模型选择

目前学者关于农业补贴实施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基于 OLS 的线性回归方程;二是运用 probit^[22]或者 logistic^[23]模型来测算实施效应。由于在本研究中考虑的是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影响,需要能同时涵盖两个研究层次的模型。而过往研究所采取的模型中,OLS 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正态、线性、方差齐性和独立同分布,但对于分层的数据而言,方差齐性和独立同分布是不存在的^[24]。所以无论是采用 OLS 还是 probit 模型,并不符合本文的要求。

在现有的各种模型中,HLM 模型无疑是符合要求的一种模型。

(1) 分层探讨及选择。分层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它可以将因变量中的变异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寓于同一群体的个体差异;另一部分为不同群体之间的个体差异。通过分解差异,分层模型可以区分群体效果和个体效果,揭示了群体与个体变量之间的关系^[25]。因为调研涉及的 3 个功能区 42 个村庄在社会经济、地理区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讨论这种差异对于分析农业补贴实施的区域效应十分有必要。在两层的分层模型中,层-2 模型又有随机截距模型和随机斜率模型。它们的区别在于:随机截距模型假定两个层次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不考虑两个层次间变量的相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而随机斜率模型则考虑了两个层次间变量的相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即交互项的影响^[26]。在本文的应用中,目的主要在于分离村庄层次特征和个体农户层次特征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影响,又因为交互项影响的经济意义难以解释,故层-2 模型为随机截距模型。

(2) 模型设定。零模型是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起点,被称作为截距模型,是农户个体层和村庄层都不包括任何解释变量的模型,零模型公式如下:

层-1 方程:

$$Y = \beta_0 + \xi \tag{1}$$

层-2 方程:

$$\beta_0 = \gamma_{00} + \mu_0, \mu_0 \sim N(0, \sigma^2) \tag{2}$$

在上述方程中, β_0 为层-1 模型截距, γ_{00} 为对数发生比, ξ, μ_0 为残差项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农户层面变量,假定个体农户层面的变量不会受到村庄层面变量的影响,依据此种原则,构建如下模型:

农户层面模型:

$$Y = \sum_{i=1}^n \beta_i X_N + \xi \tag{3}$$

村庄层面模型:

$$\beta_{0j} = \sum_{j=1}^m \gamma_{0j} Z_j + \mu_{0j} \tag{4}$$

$$\beta_{1j} = \gamma_{10}; \beta_{2j} = \gamma_{20}; \dots; \beta_{nj} = \gamma_{n0} \tag{5}$$

完整模型:

$$Y = \sum_{i=1}^n \beta_i X_n + \sum_{j=1}^m \gamma_{0j} Z_j + \mu_0 + r_{ij} \tag{6}$$

式(3)~(6)中 n 是农户层面变量个数, m 是村庄层面变量个数, X_n 表示农户层面第 n 个变量, β_i 为其系数, Z_j 表示村庄层面第 j 个变量。

三、结果分析

1.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的区域效应

本文通过衡量农业补贴在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种植的的积极性方面来测度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因变量的设定采用了里克特五分式量表,分别是“极大提升”、“较大积极性”、“有一定提升,但不太大”、“积极性较小”、“可有可无,起不到作用”。通过直接对受访农户进行询问得到农户的主观评价。在分析区域效应时,将五分量表进行归并,将“极大提升”和“较大积极性”归并为一级,“积极性较小”与“可有可无,起不到作用”并为一级。图 1 为不同主体功能区农业补贴实施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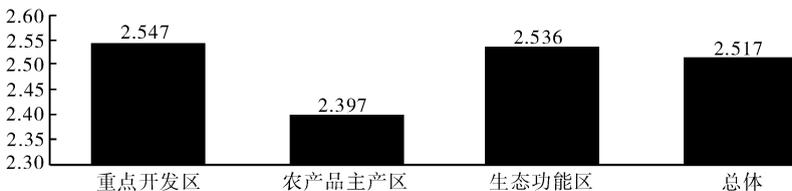


图 1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业补贴实施效应

从图 1 可以看出,农业补贴的整体实施效果较好,农业补贴实施的平均成效值为 2.517。不同主体功能区受访农户对农业补贴的评价存在着较大差异,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补贴实施成效明显低于其他两区,主要因为农产品主产区对农业生产的依靠程度比较大,对农业补贴的敏感度要高于其他两区,在目前农业补贴标准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其对农业补贴的评价也就明显低于其他两区。

表 2 为农业补贴的实施成效的各分项指标,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对各项指标积极性提升方面有一定作用的都在 30% 以上,远远高于选择积极性变差的,而这部分比例不到 10%。但是对比不同功能区的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不同指标之间的差异性比较显著。通过分析样本数据,特点如下:

(1)在接受农业先进技术、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维持农田数量、确保农田农农用途、确保农田质量、维护小型水利设施、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农产品主产区的积极性提升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部分指标比其他功能区的相关指标高出至少 10%。在接受农业先进技术、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维护水利设施、基础设施等指标的积极性提升方面比例都超过了 40%,部分指标超过 50%。通过分析,发现农产品主产区中提升程度较大的指标都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这些指标直接关乎农业种植的难易度以及粮食产量。同时,虽然农业补贴的标准相比于农业种植上的投入而言,依然偏低,但是考虑到在调查区域,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的亩均净收入在 1 200 元左右,且农产品主产区对于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故每亩一百多元的补贴金额对于该区的农户而言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2)在农业生产物质投入、机械投入、农业种植热情等方面,生态功能区的积极性提升的比例相对较高。与此相对应,农产品主产区在农业机械方面的投入相对较低,重点开发区在农田生产物质方面的投入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农产品主产区大多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根据调查显示只有 11.1% 的农户拥有旋耕机等耕地设备,大部分农户依然依靠人畜进行农业生产。而重点开发区距离城市中心较近,征地活动较频繁,农业种植情况很不稳定,农田撂荒、抛荒现象比较严重,相比于一亩一百多元的农业补贴金额,农户不愿对农田进行更多的物质投入,往往抱着种一年算一年的心态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比较期待征地活动的发生。

表 2 不同主体功能区下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指标分布特征

实施效应	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主产区			生态功能区		
	1	2	3	1	2	3	1	2	3
接受农业先进技术	0.41	0.54	0.05	0.54	0.44	0.02	0.41	0.53	0.06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0.35	0.6	0.04	0.52	0.44	0.04	0.33	0.61	0.06
维持农田数量	0.29	0.64	0.07	0.39	0.54	0.08	0.32	0.57	0.11
确保农田农农用途	0.28	0.66	0.07	0.32	0.61	0.06	0.29	0.59	0.12
确保农田质量不降低	0.33	0.59	0.08	0.35	0.54	0.11	0.27	0.61	0.11
在农田生产物质投入	0.43	0.52	0.05	0.44	0.55	0.01	0.57	0.34	0.09
在农业机械方面投入	0.46	0.49	0.05	0.43	0.56	0.01	0.51	0.41	0.09
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	0.39	0.58	0.04	0.39	0.6	0.01	0.45	0.48	0.07
促进土地转租转包	0.27	0.68	0.05	0.19	0.81	0	0.22	0.62	0.07
维护小型水利设施	0.38	0.57	0.05	0.42	0.57	0.01	0.37	0.57	0.06
维护基础设施	0.38	0.58	0.04	0.42	0.58	0	0.36	0.59	0.06
农业种植热情	0.43	0.51	0.07	0.39	0.59	0.02	0.49	0.45	0.07

注:1:积极性有提升;2:不变;3:积极性下降。

(3)在促进土地转租转包等方面,三种功能区的积极性提升均不到 30%。但相比而言,农产品主产区的土地转租转包积极性提升的比例最低,重点开发区相对较高。这是因为,无论在何种主体功能区下,农户对于土地流转都持较保守的态度。在调查区域,农户们主要是依靠自家的承包田进行农业生产,他们不愿意将承包田流转给他人。根据调查结果显示,39.4% 的农户不愿意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作;60.1% 可以考虑将土地流转给其他人耕作,但是在这部分村民中有 56.1% 的只考虑将土地流转

给亲戚或认识的村民。但这样一般只会收取较低的租金,而租金太低又会抑制了土地流转积极性的提升。同时由于征地活动时时有发生,很多农户担心土地一旦流转,将来土地被征收时会因为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部分农户宁愿选择将土地抛荒,也不愿将土地进行流转。

2. 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模型选择,本文选用了HLM6.0软件对影响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因素进行了分层分析。

(1)零模型运行结果与讨论。首先考察的是两层都不放入任何自变量的零模型,其结果为: $\sigma_2 = -0.436$, $\gamma_{00} = -2.928$,所有村庄受访农户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评价的对数发生比为 -2.928 ,对应的发生比为 0.054 。同时,估计出空模型随机系数的可靠度为 0.575 ,模型的估计程度较高。

(2)随机效应截距模型结果与讨论。将经过筛选后的自变量指标放入模型中,层-2截距的残差方差估计值为 0.277 。放入指标后的解释比例为 $(0.436 - 0.277)/0.436 = 0.365$ 。这说明在层-2模型中加入了公交情况和村庄距离城镇的距离两个指标变量后,这两个指标可以解释原来截距方差的 36.5% 。且加入指标后的可信度为 0.456 。模型估计的可信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运行结果如表3,结果如下:

1)在村庄层面,村庄的是否有公交到达城镇这个指标在 5% 下显著。该变量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成正向关系。调研区域涉及42个村庄,其中12个村庄拥有到达附近城镇的公交。在有公交的12个村庄中,重点开发区有8个,所占比例为 75% ;农产品主产区有4个,所占比例为 25% ;生态功能区0个,所占比例为 0% ;这与现实相契合。

2)在个体农户层面,是否为村干部、对自身的信心指数在 10% 下显著,耕地块数、对灾祸抵抗能力在 5% 下显著,生产工具情况在 1% 下显著。以上这些指标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原因如下:

是否为村干部:该项指标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因为相比于普通农户,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对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更为了解,他们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具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在对于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担任过村干部的受访农户中对国家农业政策比较关注的占到 26.3% ,而没有当过村干部的受访农户对国家农业补贴的相关政策比较关注的占 10.3% ,虽然整体关注度不高,但是当过村干部的对政策的关注度以及熟悉程度是远远大于普通农民的。

对自身的信心指数:该项指标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其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具有正向影响,这个结果与现实是契合的。因为对自身信心程度高的受访农户多将农业补贴视为额外的收入,对农业补贴的具体金额并不在意,不会过多的关注补贴的标准。而那些自身信心程度不高的农户,往往家庭条件不算好,他们把改善生活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国家和政府身上,所以对于调查区域一亩一百多元的农业补贴标准不甚满意,这也降低了其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效果。表3为农业补贴实施效果影响因素分层分析结果。

耕地块数:该项指标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耕地块数越多的农户其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的评价也越高。农村是以“好田搭坏田”的原则进行分田的,而耕地块数不仅反映土地的破碎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农户所拥有承包地的相对多少。虽然耕地块数增多、单块耕地面积较小不利于规模化经营,但由于在调查区域,农业机械化程度偏低,依靠人畜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比较倾向面积较小的单块耕地。

对灾祸的抵抗能力:数据分析表明,对灾祸抵抗能力越强的受访农户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取得效果的可能性也越大。其原因在于当灾祸(比如旱涝灾害、虫灾等)降临时,抵抗能力较低的农户对国家政策的相关标准的敏感程度会更高。在目前农业补贴标准相对较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其对农业补贴取得成效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农业生产工具:该项指标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其显著程度高于其他指标。一方面因为政府会直接对农业生产工具的购买提供补贴,受访农户家庭生产器械越多,其能拿到的农业补贴金额也越多。另一方面由于拥有更多的农业生产器械工具,其农业机械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其生产效果也比传统模

表 3 农业补贴实施效果影响因素分层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优势比	显著程度	95%置信区间
截距 1, β_0					
截距 2, γ_{00}	-3.083	0.188	0.046	<0.001	(0.029, 0.071)
距离, γ_{01}	0.019	0.027	1.019	0.488	(0.945, 1.100)
是否有公交, γ_{02}	0.710	0.271	2.034	0.013	(1.174, 3.523)
是否为户主, β_1					
截距 2, γ_{10}	0.365	0.263	1.440	0.167	(0.886, 2.341)
性别, β_2					
截距 2, γ_{20}	-0.418	0.280	0.658	0.135	(0.402, 1.077)
年龄, β_3					
截距 2, γ_{30}	0.006	0.010	1.006	0.58	(0.987, 1.025)
教育程度, β_4					
截距 2, γ_{40}	-0.009	0.027	0.991	0.731	(0.935, 1.050)
是否为村干部, β_5					
截距 2, γ_{50}	-0.457	0.285	0.633	0.091	(0.373, 1.076)
是否务农, β_6					
截距 2, γ_{60}	-0.104	0.208	0.901	0.615	(0.568, 1.429)
信心指数, β_7					
截距 2, γ_{70}	0.356	0.183	1.428	0.052	(1.018, 2.002)
幸福指数, β_8					
截距 2, γ_{80}	0.170	0.142	1.185	0.235	(0.875, 1.604)
对灾祸抵抗能力, β_9					
截距 2, γ_{90}	-0.288	0.122	0.750	0.019	(0.588, 0.956)
人均耕地, β_{10}					
截距 2, γ_{100}	-0.026	0.036	0.974	0.465	(0.905, 1.048)
农业收入所占比, β_{11}					
截距 2, γ_{110}	-0.046	0.045	0.955	0.315	(0.870, 1.049)
生产工具情况, β_{12}					
截距 2, γ_{120}	0.303	0.091	1.354	0.001	(1.115, 1.643)
耕地块数, β_{13}					
截距 2, γ_{130}	0.025	0.011	1.025	0.028	(0.994, 1.057)
贷款容易度, β_{14}					
截距 2, γ_{140}	-0.114	0.109	0.892	0.295	(0.738, 1.078)

式明显,这也会直接提升农户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

四、结论与建议

从重点开发区、粮食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典型主体功能区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文采用 HLM 分层模型从村庄层面和农户个体层面来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农户对于农业补贴的评价。此项研究有效地克服了农户与村庄之间交互作用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可以多层次关注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农业补贴政策对于鼓励农户接受农业先进技术、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增加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和机械投入、维护小型水利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提高农业种植热情等方面成效显著。但由于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户对自家耕地的承包权意识,为了避免土地流转带来麻烦,农业补贴对于促进土地转租转包等方面的积极性作用较小,甚至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 在村庄层面,村庄是否有公交对于农户感知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拥有公交的村庄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高于其他村庄。在农户个体层面,担任过村干部,对自身自信程度较高,拥有较强抵抗灾害能力,耕地块数越多,农业生产工具越多的受访农户对于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评价价值较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考虑的指标体系还不太完整,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

(3) 受到区域发展情况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不同功能区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着很

大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受访农户对政府农业补贴标准的敏感度较高,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民。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目前农业补贴标准相较于日益高涨的生活生产成本来说普遍偏低。政府应加大补贴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补贴重点向种粮优势区域倾斜。农产品主产区的农户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较低。而农产品主区内种粮比例较高,补贴标准偏低。为了鼓励农户进行粮食种植生产,补贴政策的重点应该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倾斜。同时考虑到农产品主产区普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方面应当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的支持保护力度。

(3)进一步明确农户对于土地的财产权及其流转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户的承包权意识,对于土地流转存在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为了鼓励农村耕地的有序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也为了保护农户自身的合法权益,政府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户对于承包地的财产权,本着保护农户切身利益的原则,合理处理土地流转后增值所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

(4)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反对“一刀切”的做法。在明确相关问题底线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大胆尝试,并充分保证农户的切身利益。

参 考 文 献

- [1] 李维林. 转轨期中国农业补贴及其效应研究[D]. 青岛: 山东大学, 2010.
- [2] 尹凤梅.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趋势分析[J]. 西部论坛, 2007, 17(1): 89-92.
- [3] 冯继康.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 历史演变与发展走势[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3): 73-78.
- [4] 刘彦伯.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优劣与启示[J]. 经济纵横, 2013(8): 121-124.
- [5] 李自海. 欧盟农业补贴政策的分析及探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3, 24(2): 123-125.
- [6] 陶群山. 欧盟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及启示[J]. 经济纵横, 2010(5): 110-113.
- [7] 周建华, 贺正楚. 日本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及启示[J]. 农村经济, 2005(10): 123-126.
- [8] 张莉, 朱增勇, 司智陟. 国外农业补贴的特点与发展趋势[J]. 价格月刊, 2011(8): 70-74.
- [9] JAMES P G. 富国的农业政策[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71.
- [10] LITTLET, SCITOVESKY I, SCOTT M. 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与贸易: 一个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工业出版社, 1970.
- [11] ANDERSON K, HAGAMI Y. 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透视中的东亚经验[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5.
- [12] LOPEZ R, GALINATO G I. Should governments stop subsidies to private goods? Evidence from rural Latin Americ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1(5-6): 1071-1094.
- [13] WISE T A. The paradox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measurement issues, agricultural dumping, and policy reform[C]. Working paper, 2004.
- [14] 程国强. 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启示与借鉴[J]. 红旗文稿, 2009(15): 22-24.
- [15] 柯炳生. 欧美农业补贴政策[J]. 中国科技成果, 2005(5): 46-47.
- [16] 田维明, 张莉琴, 周章跃. 中国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的经验和方法问题[R]. 绍兴: 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 2002.
- [17] 朱希刚, 万广华, 刘晓展. 我国 1993 年和 1994 年农产品生产者补贴等值的测算[J]. 农业经济问题, 1996(11): 37-42.
- [18] 张莉琴. 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保护效果分析[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01.
- [19] 钱克明. 中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J]. 农业经济问题, 2003(1): 41-45.
- [20] 陈波, 黄宁阳, 王雅鹏. 关于对粮食主产区农民直接补贴问题的思考[J]. 农村经济, 2004(4): 19-21.
- [21] 刘鹏凌. 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及其效果研究[D].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2005.
- [22] 张淑杰, 孙天华. 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 360 户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12): 68-74.
- [23] 杨小静, 冷熠, 宗义湘. 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 376 个农户调查[J]. 农村经济, 2010(1): 20-22.
- [24] FERRER I C, FRIJTERS P.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J]. Economic journal, 2004, 24(497): 641-659.
- [25] 杨菊华. 多层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3): 44-51.
- [26] 曾寅初, 刘媛媛, 于晓华. 分层模型在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研究中的应用——以北京市消费者对月饼添加剂支付意愿的调查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1): 84-90.

(责任编辑:陈万红)